

鄒讜教授《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序

● 甘 陽

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牛津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

鄒讜教授的《二十世紀中國政治》一書即將與讀者見面。鄒先生命我為該書略作引言，我竟不揣淺陋而冒然應命，蓋因為我深願向海內外讀者廣為推薦此書，尤其對那些關心中國政治發展、關心建設民主的制度和規範的朋友們，此書乃不可不讀。

中國政治如何向民主過渡？

鄒讜教授這部著作共由十章組成。儘管各章並非寫於同一時間，所處理的具體問題也不盡相同，但它們可以說都是圍繞着鄒先生經年累月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而展開的，這就是：中國政治如何「向民主過渡」(Transition to Democracy)。不消說，這也正是許許多多的人所共同關心的時代性大課

題。但鄒讜的不同之處在於，他所關注的重心與其說是「民主」這個詞或概念包含着多少好東西，不如說是集中在「過渡」這一具體過程的複雜性和困難性。因此，與時下許多人不同，鄒讜很少高談闊論西方自由主義是如何如何，以便來證明或批判中國政治的不民主性，相反，他所着重探討的是，在中國社會歷史的給定條件下，向民主過渡是否可能？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是哪些「機制」(mechanisms)阻礙了過渡？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又是哪些「機制」可能發生作用？在北美研究中國當代政治的學者中，鄒讜的分析一向被公認為以細膩見長，我以為事實上是與鄒先生不以單純的否定批判態度為然，而始終着眼於對具體機制進行分析這一立足點有很大關係。

作為在西方政治學界的理論氛圍之內從事研究工作的資深政治學家，鄒讜教授對於晚近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發展，特別是西方學者

對「向民主過渡」這一重大課題上的研究進展，可以說比任何人都更瞭如指掌。但也正因為如此，他或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意識到，西方學術界所建立的種種理論、模式及方法，並不能簡單照搬而用來分析中國政治的發展。鄒先生數十年來的政治學研究，可以說一直在摸索如何立足於中國政治的經驗之上而又充分利用西方政治學研究的成果，以逐步建立和發展能夠用來說明和分析中國政治現象、總結中國政治經驗的「中國政治學」。在本書第一組文章如〈中國二十世紀政治與西方政治學〉、〈中國政治學的發展與西方社會科學〉，以及〈如何發展新中國的政治學〉等篇中，鄒謙均反復強調以下兩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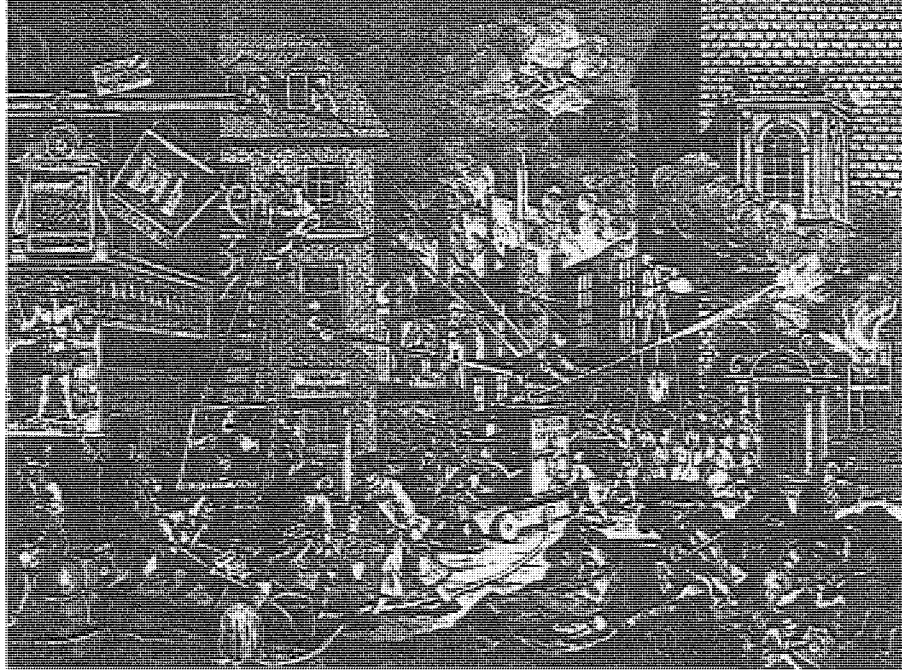
一、「所有國家的政治學所研究的問題和結論，都受本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他特別舉美國為例，指出美國政治學的發展事實上就是不斷擺脫歐洲（特別是德國）政治學的影響，立足於美國政治的現實而逐步成型的。例如美國早期政治學不像歐洲政治學那樣突出階級問題，而以利益集團和壓力集團為研究重心，即與美國本身的政治現實和文化歷史背景有關。因此鄒先生強調指出，要發展「中國政治學」，「就一定要以中國的歷史作為我們提出理論問題、作出結論的根據。」在鄒謙看來，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經驗在其豐富性和複雜性上是很少有其他國家可以比擬的，因此中國學者理應在這個厚實的經驗基礎上去「創造中國自己的政治學，使之在世界政治學中佔一席之地」。

二、但鄒先生同時強調，「中國要發展自己的政治學，就要建立起無數的，至少是多數的，不同的政治學體系。如果某一個國家只有一個政治學體系，這個國家就沒有發展真正的政治科學的可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鄒謙突出強調了深入研究西方政治學發展的重要性，因為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特點即在不同學派林立，從而可以為我們提供多元的、而非單一的參照系。

鄒謙先生本人數十年來的研究可以說正是走在他自己所主張的這一道路上。一方面，他的所有研究始終都是從中國政治的具體經驗出發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不難看出，他對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所產生的新方法和新成果始終保持着高度的敏感性，從而不斷吸取這些新方法和新成果以充實、完善他自己的分析構架和方法。例如，如果我們仔細比較一下本書第二組文章（大多寫於80年代初和80年代中期）與單獨構成本書第三部分的最新長文（初稿寫於1990年而定稿於1991年），我們或許會看出，二者之間在對中國政治的分析上一方面有着明顯的連續性，但另一方面在觀察的角度甚至方法上都已經有某些不易察覺但卻意味深長的差異和變化。我個人認為，鄒先生研究視角和取向上的這些細微變化，在某種意義上是與晚近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風氣變化，特別是對「向民主過渡」這一課題研究上的一些重要發展不無關係的。因此我們或有必要略為了解一下晚近以來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狀況，才能比較明瞭鄒謙教授的某些分析角度。

所有國家的政治學所研究的問題和結論，都受本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影響。美國政治學的發展事實上就是不斷擺脫歐洲政治學的影響，立足於美國政治的現實而逐步成型的。

市民社會和公共空間，是一切形式的民主的先決條件？



宏觀歷史社會學之不足

大約一直到70年代末為止，西方政治學界對「向民主過渡」這一問題的主流研究路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現代化」理論研究的一部分，或用鄒先生在芝加哥大學政治系的同事和朋友日涅斯基教授(Adam Przeworski)的話說，屬於「宏觀歷史比較社會學」(macro-historical comparative sociology)的路向。其代表性文獻包括李普塞特(Lipset)的《民主政治的若干前提：經濟發展與政治正當性》(*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1959)，以及摩爾(B. Moore)的《專制與民主的社會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1966)等。這一宏觀歷史比較社會學路向的基本特點是：突出地強調了社會經濟歷史條件對於走向民主政治的制約

性。至今仍然在非政治學界非常流行的很多說法，諸如「因為某國還沒有中產階級，所以不可能有民主」，或「該國農村人口和農業生產仍佔主導，所以不可能有民主」，等等，大體都與宏觀歷史比較社會學路向的觀點有關。許多人甚至由此而想當然地認定：只要經濟發達了(由此中產階級就多了、農民就少了，等等)，政治民主自然也就隨之而來了。

但是，大約從70年代後期起，這種「宏觀歷史社會學」的主流路向開始日益受到挑戰。其原因來自實踐與理論兩方面。就實踐上講，60年代以來的大量經驗研究和統計分析表明，工業化、現代化的發展與政治民主化之間並無直接的因果關係。尤其在許多後發展國家中，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展不但沒有與政治民主化比肩而行，反而恰恰伴隨着民主政體的崩潰。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向民主過渡」的過程遠比

宏觀歷史比較社會學的基本特點是：突出地強調了社會經濟歷史條件對於走向民主政治的制約性。大約從70年代後期起，這種主流路向開始日益受到挑戰。

人們想像得更為複雜，從而促使人們開始批判地反省「宏觀歷史社會學」路向之不足。

宏觀路向所受到的另一挑戰則可以說來自西方社會科學在理論上的進展。大約也是從70年代中、後期開始，以「博奕論」(game theory)和「理性選擇理論」(rational choice theory)等方法論的發展為基礎，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重心日益轉向個體和集體行動的「微觀機制」，轉向於研究各種理性和非理性的「偏好」(preferences)和「選擇」機制對人類行動和互動的影響。這種「微觀取向」(micro-oriented)的理論轉向在政治學研究中帶來的一個明顯變化就是，研究的重心日益注重於：在具體的歷史情景下(微觀)，政治行動者們會選擇甚麼樣的行動方式和策略(可選擇性)，以及這些行動方式和策略在各方互動過程中所產生的政治結果。從這種微觀取向研究的角度看，宏觀歷史社會學路向的最大弱點就在於它有大強的「決定論」色彩，似乎給定了社會經濟歷史發展條件，個體和群體不管怎樣行動都只會有同樣的結果。而事實上，相當明顯，即使在相同的社會經濟歷史發展條件下，個體和群體也決非就注定只有一種選擇，而總是可以作出不同的選擇、不同的決定。微觀策略分析取向所強調的就是，這些不同的選擇、不同的決定，是會帶來不同的政治結果的，是實實在在影響着事件的發展和有關個體與群體之命運的，從而也就在影響着社會歷史發展本身。

不妨說，如果以往「宏觀取向」

對向民主過渡的研究突出地強調了社會經濟發展對於向民主過渡的「客觀」制約性，那麼今日「微觀取向」對向民主過渡的研究則突出地強調了政治行動者的行動方式(策略選擇)與目標取向(偏好)對於向民主過渡的「主觀」制約性。換言之，從微觀分析的角度看，「向民主過渡」之所以失敗以至出現悲劇，在許多情況下往往並不在於「客觀歷史條件」的制約，而恰恰在於政治行動者們「主觀行動能力」的制約。也就是說，如果行動者們在當時選擇了不同的策略行動方式，其政治結果很可能完全不同。「微觀取向」對向民主過渡的研究特別着重於分析：在政治衝突過程中，相衝突的政治行動者之間是否可能出現某種通過談判去謀求妥協的機制，在他們看來，如果出現這種機制，則「向民主過渡」的成功可能性就大，反之則小甚至無。因為在他們看來，民主政治與威權政治(authoritarianism)的根本區別就在於民主政治是以制度化的談判妥協方式來解決政治衝突的，因此，所謂「轉出威權走向民主」(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ism towards Democracy)的過程，說到底就是去建立各種談判妥協的機制並使之制度化的過程。微觀取向派對宏觀歷史社會學路向的一個有力挑戰就是：這樣一套以談判妥協方式來解決政治衝突的制度安排和社會心理，決不是隨着社會經濟的發展就能自然產生，而只有在政治過程中不斷學習和實踐才能逐步建立和培養起來。(關於微觀分析路向的代表作，可參Prezeworski:

宏觀歷史社會學路向的最大弱點就在於它有大強的「決定論」色彩，似乎給定了社會經濟歷史發展條件，個體和群體不管怎樣行動都只會有同樣的結果。

Democracy and the Market: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Cambridge 1991; 以及 O'Donnell 等人編四卷本: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Baltimore 1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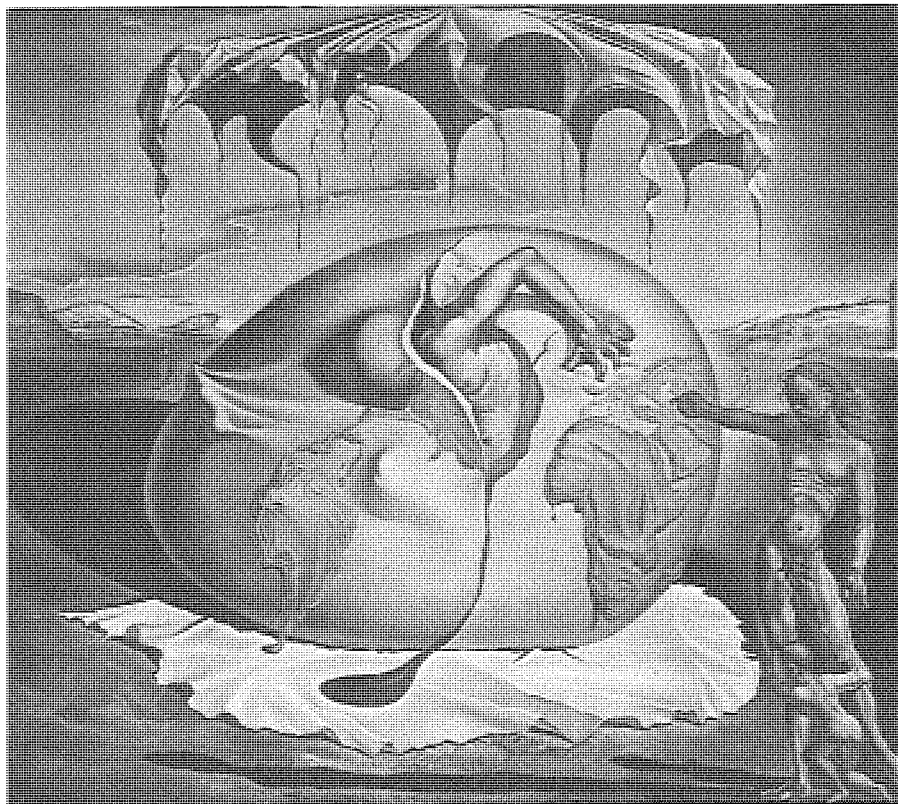
以上述西方政治學界對「向民主過渡」研究的範式變化這一學術背景為參照，再回過來讀鄒讜教授的著作，我們或許會感到：鄒先生在研究當代中國政治時所使用的方法及分析取向，與西方政治學研究的發展似乎有某種明顯的平行性。大體而言，鄒先生以往的分析路向是比較着重宏觀歷史分析的，亦即他特別強調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分析應以對帝制崩潰以來中國政治在二十世紀發展的全過程有一總體把握為基礎，這在收入本書第二組的文章中如〈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中國文化〉、〈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與中國知識分子〉，以及他的英文著作如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 (1986) 等都可看出；但在鄒先生最近的研究中，卻明顯有一種日益注重微觀行動分析的傾向。這在本書中特別明顯地表現在組成本書第三部分這篇分析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最新力作上(該文在英美學術界已被公認是迄今為止對天安門事件所作的最出色的政治學分析)，該文後半部分的分析已基本上是一種「微觀取向的策略行動分析」(micro-oriented strategic analysis)。鄒先生在這部分的分析中之所以不厭其詳地複述天安門時期的許多細節，實際上都是想指出：1989年的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

機會跨出向民主過渡的第一步，即初步建立某種(哪怕是相當有限的)談判妥協的機制，但是，這些機會卻都未能被充分利用，因為當時主導時局的兩派政治行動者，即當局中的強硬派和社會上的激進派，都同樣不願選擇以談判妥協解決政治衝突的政治行動方式，而是雙方都選擇「堅決鬥爭、絕不妥協」、「不屈不撓、寸步不讓」的政治行動方式，從而終於仍然落入了「一方必須吃掉另一方」、或鄒先生所謂「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相當於博奕論中的「零和博奕」)這種最古老、最原始的政治格局。

結構與主體的辯證綜合

但我們應該立即指出，鄒讜教授對當代中國政治的分析儘管在取向、方法等各方面都深受西方政治學研究發展的影響，但他對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卻始終保持着他自己的距離。確切地說，他始終是從中國政治的具體經驗出發去選擇、檢驗和修正西方的理論與方法，而非削足適履地用西方的尺度來首單套裁中國的經驗。例如，儘管他近年明顯受到微觀策略分析方法的影響，並在其1990年這篇長文的下半部分中具體運用了這種分析，但我們同樣可以注意到，該文上半部分所提供的恰恰是一個「宏觀歷史分析」的構架。換言之，鄒先生並不因為採用了微觀行動分析的方法就完全放棄宏觀歷史的分析方法，並不像目前許多西方學者那樣把宏觀與微觀、歷史與行動、結構與主體完全

鄒先生指出：1989年的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跨出向民主過渡的第一步，但是，因為當局的強硬派和社會上的激進派，都同樣不願選擇以談判妥協解決政治衝突的政治行動方式，從而終於仍然落入了「一方必須吃掉另一方」的政治格局。



結構對主體的制約和主體對結構的超克，二者之間存在辯證的綜合關係。

對立起來。我們在他這篇最新長文中所看到的毋寧是，鄒讜似乎正力圖結合宏觀取向與微觀取向、歷史結構分析與主體行動分析這兩種角度，以更深入、更辯證地理解和分析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正是通過該文上半部分對中國自帝制崩潰以來政治發展的宏觀歷史分析，鄒先生向我們指出，在中國要想逐步建立一套談判與妥協的制度化安排即「向民主過渡」，本來就有着特別的困難，亦即受到比其他許多國家更多的歷史結構性制約；但另一方面，正是通過對1989年中國各方政治行動者們行動方式（策略選擇）的微觀分析，鄒先生強調指出，儘管有這種歷史結構性的制約，中國的政治行動者們在1989年本來並不是完全沒有機會取得「向民主過渡」的

局部性突破，亦即初步建立某種談判妥協的機制。誠如他特別指出的，當時政府與社會力量的對話已經開始，而且這種對話通過電視向全國轉播（這在各國向民主過渡過程中都是很不容易取得的重要突破），如果社會力量這一方能及時抓住這種機會作出相應讓步，以努力使這種對話談判繼續下去從而穩固自己作為談判對手的地位，那麼，1989年的中國很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政治格局。

正是通過這種宏觀與微觀、歷史結構與主體行動的交叉分析，鄒讜先生向人們着重指出：中國「向民主過渡」的複雜性和困難性，並不僅僅在於種種歷史地形成的客觀結構制約，而且同樣在於二十世紀中國政治行動者們一代又一代相互

鄒讜似乎正力圖結合宏觀取向與微觀取向、歷史結構分析與主體行動分析這兩種角度，以更深入、更辯證地理解和分析二十世紀中國政治。

正是中國政治行動者單行道式的政治行動方式在不斷地修復着、鞏固着、加強着中國歷史形成的種種非民主政治機制。

模仿所形成的政治行動方式。正如他在文內尖銳指出的，在天安門時期，社會上的激進派與當局內的強硬派是如此的相像，以致雙方可以互為對方的鏡子：一方有着新的崇高理想，另一方則有着未曾忘懷的革命鬥志；一方有着剛獲得的人民賦予權力的自我感覺，另一方則早已習慣為人民掌權；雙方有着「同樣的摩尼教式的善惡對立的世界觀，同樣的埋頭不看現實的習性，同樣的缺乏與他方溝通的能力，以及同樣的革命理想主義」。正是在這樣一種以往的政治行動方式被不斷模仿、不斷複製的過程中，中國政治行動者的政治策略選擇能力變得日益萎縮、日益狹窄，因為他們幾乎全都不假思索地認定，政治衝突只有一種解決方法，那就是「一方戰勝另一方，一方吃掉另一方」，亦即「要贏就全贏，不然就全輸」。由此，一旦衝突發生，衝突的雙方都是同樣立即高唱《國際歌》：這是最後的鬥爭——甲方相信：我們失去的只不過是手銬和腳鏈，我們贏得的將是整個世界；乙方則宣稱，我們再退半步，那就將是江山易色、千百萬人頭落地。正因為政治行動者幾乎從一開始就已把政治行動之方式自我限止為只有一種，政治策略的選擇也只有一種，那麼，政治結果也就變成了只有一種，即：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談判妥協是絕不可能的。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說是歷史形成的種種結構性制約限制了政治行動者們的主觀選擇，不如說是政治行動者的行動方式限制了歷史結構的變化和改造。因為在這樣一種

政治博奕方式中，即使歷史結構的制約已經明顯出現裂縫和空隙，即使歷史情景已經提供了機會和可能，政治行動者們也要把這些裂縫和空隙再度堵死，從而使「向民主過渡」的歷史機遇和可能白白喪失。換言之，正是中國政治行動者這種單行道式的政治行動方式在不斷地修復着、鞏固着、加強着中國歷史形成的種種非民主政治機制。

結語

鄒先生全書的結尾是略有悲愴之音的，他說他仍然相信，中國政治「向民主過渡」的前景，亦即中國人逐步建立以談判妥協機制去解決政治衝突的前景，將會像中國古詩所言：「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他說他現在已不再相信他自己活着還能看到這一「村」。我們這些比鄒先生晚生數十年的人，是否就敢相信我們活着能夠看到這一「村」？

1993年3月於芝加哥

甘陽 198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負責主編「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人文研究叢書」及《文化：中國與世界》雜誌。現為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博士研究生。已發表的主要論著有：〈從理性的批判到文化的批判〉、〈儒學與現代〉、〈自由的理念〉等，譯著有：卡西爾的《人論》、保爾·利科的《詮釋學四講》、哈貝馬斯的《合法性危機》等。